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解读（中）*

Reading the *Map of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from the Kangxi Period（Part 2）

王其亨　张凤梧
WANG Qiheng, ZHANG Fengwu

摘　要：康熙八年（1669）《皇城宫殿衙署图》是现知最早的有关古都北京皇城建筑布局的皇家舆图。1934 年刘敦桢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获见该图，惊叹为推求北京皇城宫苑明清交替之状不可或缺的稀有秘笈。旋因避祸战乱，该图自 1935 年 11 月后历尽坎坷，辗转流徙，直到 2008 年方现身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学界长期无缘利用，滞碍了相关研究。2013 年天津大学幸获高仿复制版，大量细节得以认知。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本文综罗相关文献，谨以发现、流转、诠读、歧见、新识诸项，概略归纳有关该图的研究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

关键词：《皇城宫殿衙署图》；舆图；中国国家图书馆；刘敦桢；朱偰；台北故宫博物院

Abstract: The *Huangcheng gongdian yashu tu* (Map of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produced in 1669 during the Kangxi period is the earliest known imperially commissioned map that depicts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of the imperial palace in the historical capital of Beijing. In 1934, when Liu Dunzhen found it in the (Pek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e noticed that the map was a valuable, rare re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ansition in architectural layout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since November 1935, the map was moved several time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due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war-related events, until it reappeared in an exhibi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in 2008. In 2013, it was finally possible to launc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map, because Tianjin University received a high-quality replica showing many details. In order to promote fu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interprets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discussing issues of discovery, circulation, an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theories) and suggests a new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p.

Keywords: *huangcheng gongdian yashu tu* (map of government offic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historical map;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Liu Dunzhen; Zhu Xie;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文章编号】2096-9368（2021）01-0004-15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A
【修改日期】2021-01-27

【作者简介】
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
张凤梧，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52038007）
《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解读（上）》参见《建筑史学刊》2020 年第 1 期

4 诠读

如前述，1934 年 9 月，中国营造学社（下称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图 1）、编纂单士元（图 2）二位先生惊喜获见平图藏《皇城图》，翌年 12 月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下称《汇刊》）第 6 卷第 2 期发表《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下称《年代考》），成为诠读该“稀有秘笈”的开山之作。其主旨如刘先生强调，在于考实学界迄未判明的该图作者及成图时间：

余辈校读此图最感困难者，即图无绘者姓名，亦未签注年月，不足援为史地考证之用。[1]107

文中首先简析《皇城图》的内容（参见上篇图 3）：

图 1　刘敦桢（1897—1968）

图 2　单士元（1907—1998）

图绢本，高二·三八公尺，阔一·七八七公尺。殿阁房屋，悉以墨线界画，未傅粉色，惟河池树木，另施深绿色，以资区别耳。图之范围，南起大清门，东至东安门，自此西北，包地安、西安二门于内，即明皇城三十六红铺内之区域。其中宫阙、苑囿，下逮坛庙、官署、民居、街衢、河道、津梁之属，靡不觏缕毕具，厘然呈于目前。[1]106

随后切入《年代考》主题，对《皇城图》所涉建筑，分为大内宫殿、苑囿、官署、祠庙等四项，将有关文献对应列表，与图细致比对，逐一考订其营造时间。

受惠于学社在平图特设研究室❶，刘先生得以细审并拍摄《皇城图》及局部照片❷（图 3）。

然而，日寇侵华危局迫使故宫文物大批南迁（图 4）[2-4]❸，导致可征文献仅《东华录》《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史》《古今图书集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金鳌退食笔记》《顺天府志》等❹，判析《皇城图》成图年代至关重要的顺治、康熙朝的《实录》《起居注》与《大清会典》，尤其是宫廷满、汉文档案，都无缘稽查❺，因而相关考据以及文章篇幅都远逊先前刘先生大作《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和《易县清西陵》❻。

尽管如此，在学社上下一心，力克时艰，奋力创构中国建筑史学的忘我拼搏中❼，刘敦桢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精神，坦诚申明：“此图实为清初极重要之史料，不能因微疵弃置不顾，因将校读经过，公诸同好，尚冀大雅宏达，纠其谬误，补其阙漏，则幸甚矣。”[1]107❽

首先是《年代考》的重点，即诠读（一）大内宫殿

---

❶　1931 年 4 月《汇刊》第 3 卷第 1 册 185 页《本社纪事》：“本社编纂瞿兑之、梁述任二君工作时间多在图书馆内，蒙该馆当局给予研究室及书库之种种便利，本社至为铭感。”1931 年 7 月至 1932 年 6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研究室之设立。梁启雄，营造学社编纂，哲匠录；瞿宣颖，营造学社编纂，北平志、建筑史、方志考。”

❷　拍摄时间当在 1935 年 12 月遵照民国政府教育部将平图重要书籍舆图再度装箱南运前。其中学社拍摄《皇城图》各局部照片 24 幅（各 15.6 厘米 ×11.3 厘米），可参见中国园林博物馆藏品。

❸　1933 年 1 至 5 月，故宫博物院奉民国政府行政院令，将故宫文物分五批装箱南迁，包括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清史馆档案、起居注、实录、舆图等上千箱。参见北平故宫博物院 1933 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南迁档案文物清册》及 2011 年 12 月张会超著《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

❹　刘敦桢《年代考》列表引征文献及频次，可见刘先生主要依托的是缺漏、避讳篡改严重的《日下旧闻考》，实属被迫无奈。

	东华录	日下旧闻考	国朝宫史	图书集成	会典事例	金鳌退食笔记	北大内阁档册	顺天府志
宫	2	13	3	2	2			1
苑		2				3	1	
署		4			1			
庙		3						2
共	2	22	3	2	3	3	1	3

除表列文献外，文中尚涉《内阁旧档辑刊第二编·书籍表章目录》《明史·流寇传》《烈皇小识》《明季遗闻》《芜史》《宸垣识略》《燕都丛考》《天咫偶闻》《元史·泰定帝纪》等。

❺　基于清代建筑尤其是宫殿园囿测绘研究的需求，学社自 1933 年即曾着手编辑《清代建筑年表》，由单士元先生担纲：“先利用清《实录》《东华录》《会典》《工部则例》、各省地方志、内务府档案以及私人笔记等书，作建筑年表初步之检索。”（1934 年 6 月《汇刊》第 4 卷第 3 期页 341《本社纪事》）到 1935 年，年表编辑工作重心由外朝转向内廷，尤其是苑囿：“惟内廷事秘，采集较难，现正抄录故宫文献馆所藏内府档案，先从苑囿方面着手。”（1935 年 3 月《汇刊》第 5 卷第 3 期页 115《本社纪事》）对此工作，刘敦桢《年代考》专门提到：“……建置因革，非寻常官书所能详具，而内府档册，迄今犹未整理竣事。”然而因战乱掣肘，延至 1937 年《清代建筑年表》才大体就绪，嗣后书稿与学社其他资料移存天津，1939 年竟遭水灾浸蚀。

❻　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连载于 1933 年 9 月《汇刊》第 4 卷第 2 期 100–155 页，1934 年 6 月《汇刊》第 4 卷第 3、4 期 271–339 页。引征《清实录》、故宫文献馆清内务府档案、嘉庆与道光《御制诗文集》、清人笔记二十种及明人贺仲轼《两宫鼎建记》等。《易县清西陵》刊于 1935 年 3 月《汇刊》第 5 卷第 3 期 68–109 页，引据《清实录》《宣统政纪》《大清会典事例》《东华续录》《清史稿》《易水志》《惠陵工程备要》、崇陵及妃园寝《工程做法》和故宫藏崇陵工程照片等。

❼　按《汇刊》载，从 1933 年《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发表到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思成、刘敦桢及林徽因、莫宗江、陈明达、赵法参、卢树森、夏昌世、麦俨曾、王璧文等学社同仁，对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古建筑陆续展开大规模调查测绘，发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正定调查纪略》《赵县大石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定兴县北齐石柱》《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苏州古建筑调查记》《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经典成果。

❽　这正是中国营造学社一以贯之的治学精神：1932 年 3 月《汇刊》第 3 卷第 1 期首发《哲匠录》，朱启钤特意作《序》声明：“顾念作始本难，而兹业又复伟大，原非竭一二人之驽钝所能集事。同人不揣绵薄，创此椎轮，冀以嘤鸣之诚，幸获丽泽之益，而俾大辂之成。博洽君子，或饷以资料，裨补其阙漏；或锡以鸿文，纠绳其谬讹。”对其伟业，既勇于开拓，不畏艰难，不惮绵薄、阙漏或谬讹，更尊之为天下公器，向社会开放，集思广益，不断修正、充实和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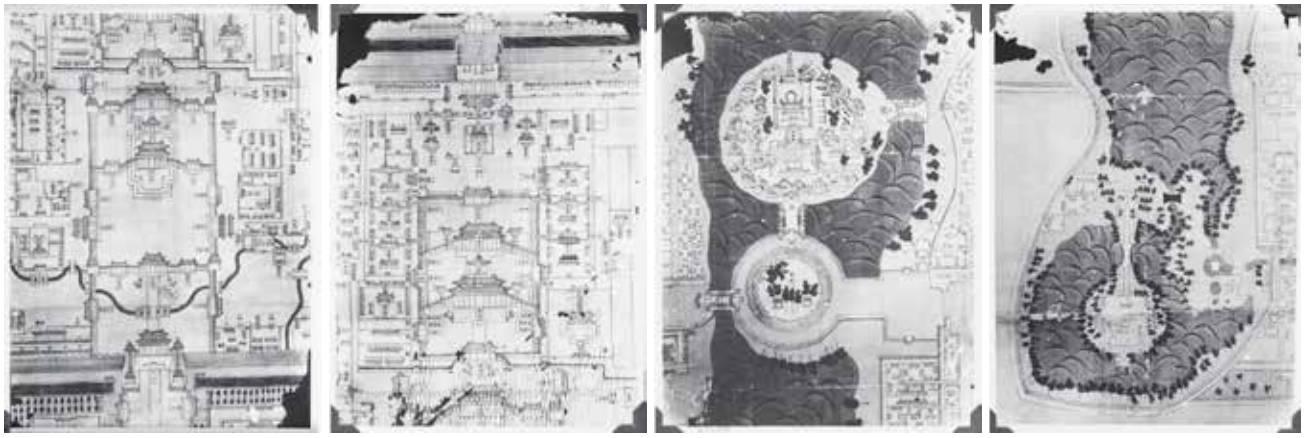


图 3　现藏北京市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皇城图》局部照片举略　自左往右：大内外朝、内廷、西苑琼岛及团城、西苑瀛台

图 4　因日寇侵临华北，1933 年 1 至 5 月故宫文物被迫装箱南迁　左：午门北装箱待运场景；右：故宫文献馆南运档案文物清册

（图 5）。将“明大内宫殿，被李闯焚毁……顺康二朝修复之建筑，见于纪载者”[1]107-108 列表校图后发现，凡“帝后妃嫔居处之所，暨政令所出，观瞻所系，不得不提前修葺者也”[1]109，即顺治朝所建“大内前部之午门、天安门，与外朝太和门，及太和、中和二殿。……内廷中央之乾清、坤宁二宫，与东路景仁、承乾、钟粹，西路永寿、翊坤、储秀六宫，及西南慈宁宫”[1]109 皆见《皇城图》。康熙朝“续营大内前部端门、文华殿……渐及左右毓庆、宁寿、启祥、长春、咸福、延禧、永和、景阳诸宫”[1]109，除康熙六年（1667）所修端门外，均未见《皇城图》。结论是：“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1]109

接着考论（二）苑囿，即“明皇城内苑囿……曰南内，曰景山，曰西苑”[1]110。其中“南内在宫城东南，入清后，析为睿亲王府及佛寺、库厂、民居，故图中所存，仅皇史宬❶、飞龙桥、秀岩山、影神殿、观心殿数处”[1]110（图 6）。又核校景山，则“明清之际，变易较微”[1]110（图 7）。对规模最大的西苑（图 8），“顾西苑隶于内务府奉宸苑，其建置因革，非寻常官书所能详具，而内府档册，迄今犹未整理竣事，兹仅就诸书所载者”[1]110，单独列表，对照《皇城图》细致考察相关建筑，多为明代遗存，清初仅及顺治修建北海永安寺白塔、南海（瀛台）迎薰亭后楼九间等，从而推判：“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1]111

继而考校（三）官署，将载述皇城内各官署建置年代的文献列表，对照《皇城图》，获见图中有顺治十年（1653）所设御药房，但康熙以后陆续设置的奉宸苑、文书馆与景山官学却“俱未标注。而内务府地点，犹署仁智殿、银匠房、内库衙门：造办处署冰窖牛圈，可窥康熙……改造前之情状，极足珍贵。……此外内阁大库称鞍房、毡库，上驷院称御马监，武备院称兵仗局，会计司称内户部，营造司称内工部，慎刑司称内刑部，掌仪司称礼仪监，尚沿用清初旧名。又织染局，司设局，酒醋局，安乐堂，汉经厂，番经厂，蜡库，米盐库，佛经板库，番经库等，胥皆存在，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1]112

最后是（四）祠庙，包括皇城内的普胜寺、弘仁寺、万寿兴隆寺、天王殿等，仍皆将相关文献列表，据以考核《皇城图》，确认“均足为比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1]113

❶　按：原图中标“宬”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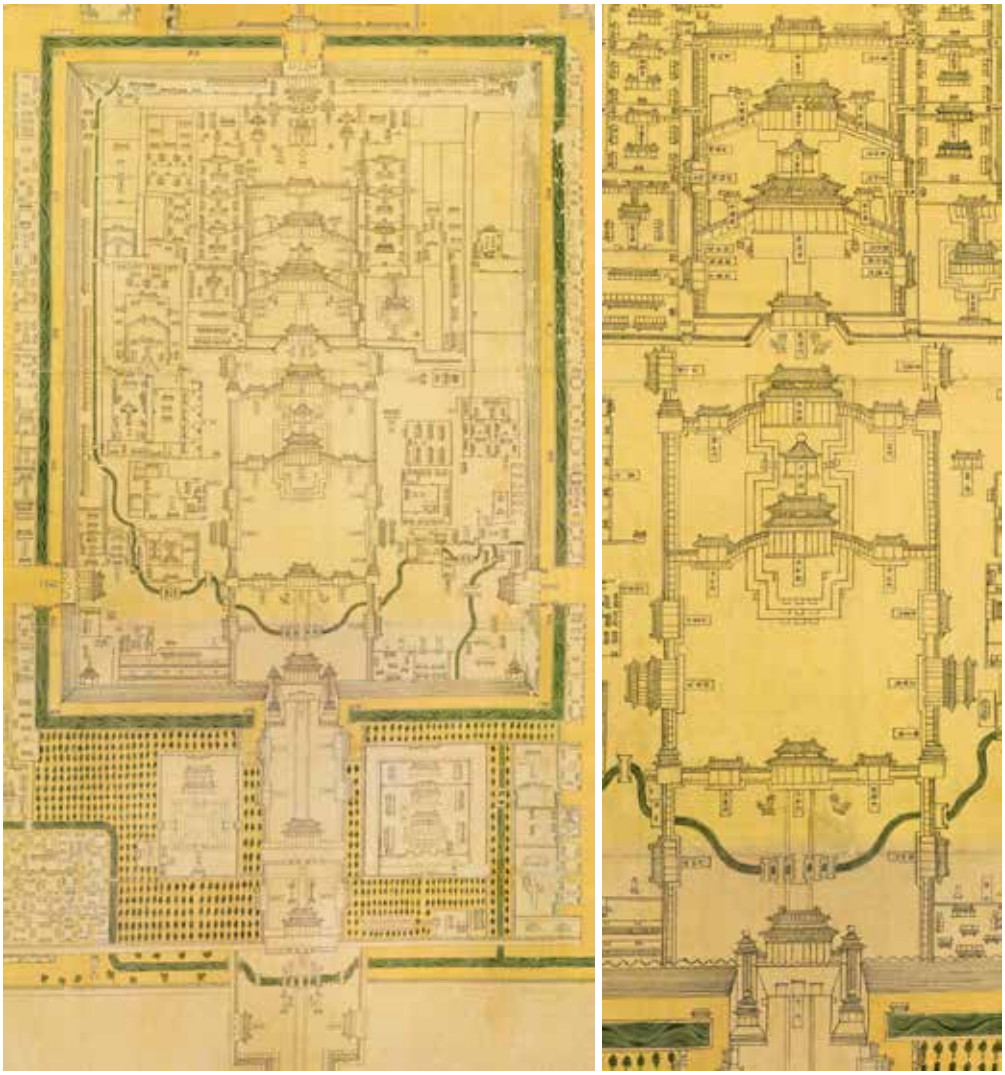


图 5 《皇城图》中的大内宫殿　右为局部：由午门至坤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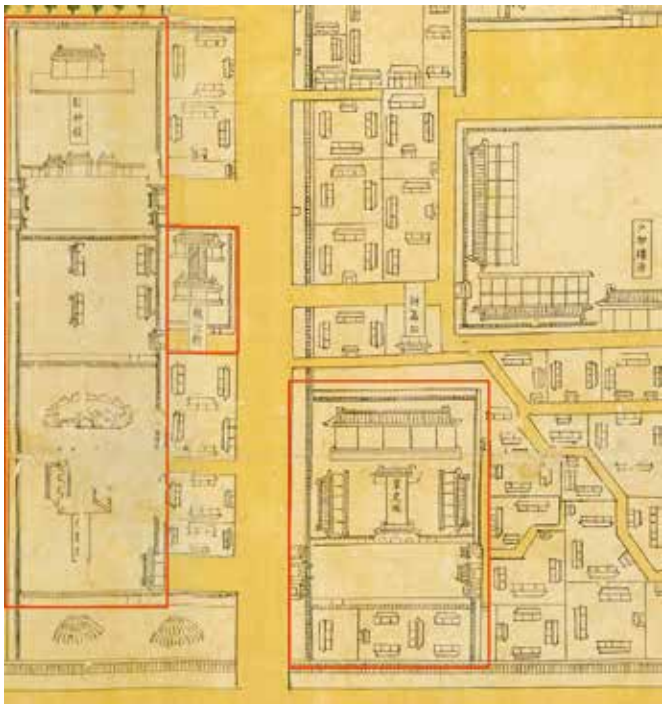


图 6 《皇城图》中的南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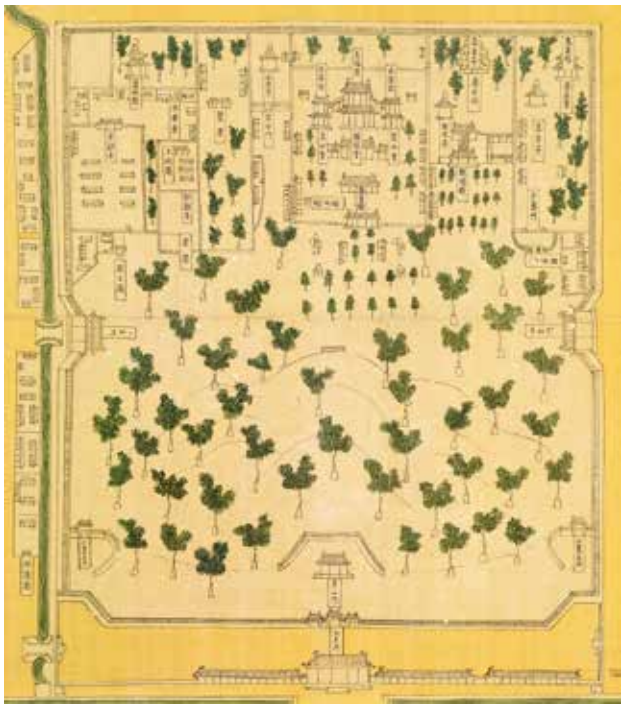


图 7 《皇城图》中的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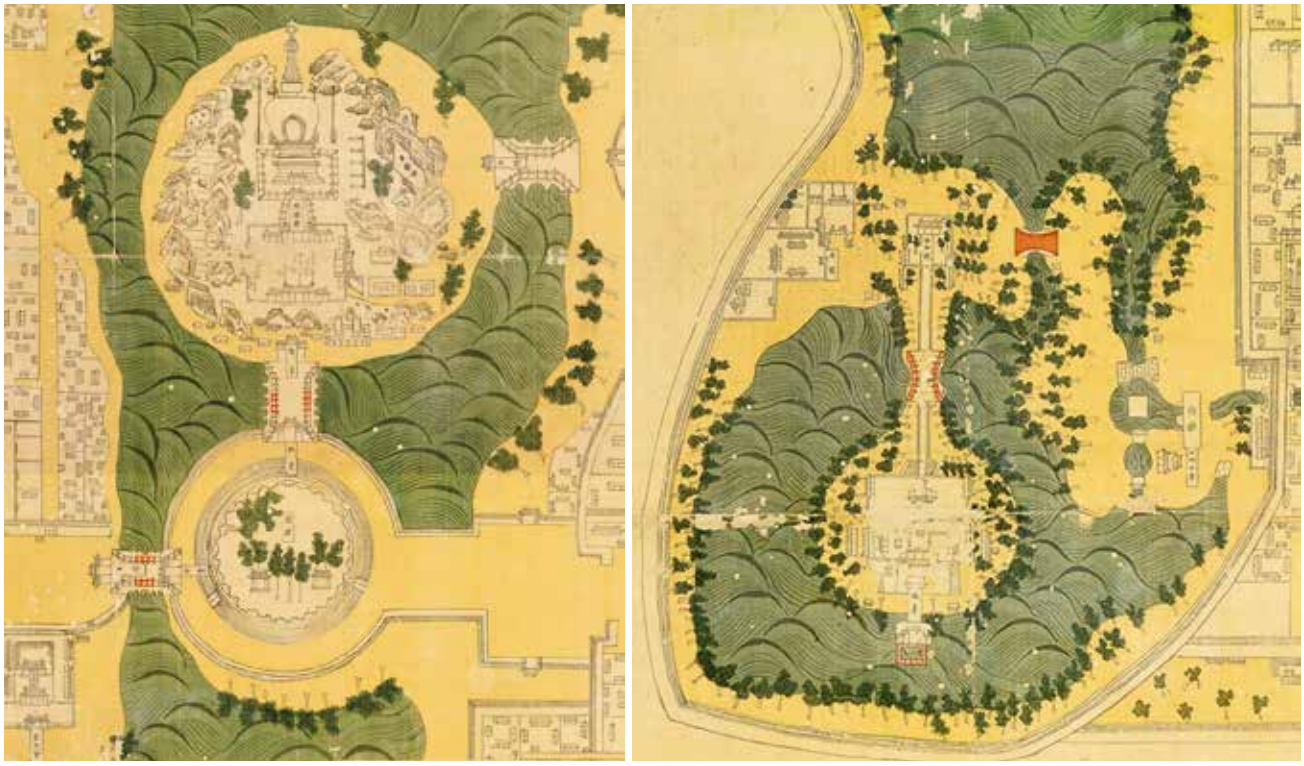


图 8 《皇城图》西苑中的北海琼岛与团城（左）；南海瀛台（右）（注意瀛台部分图像模糊甚至残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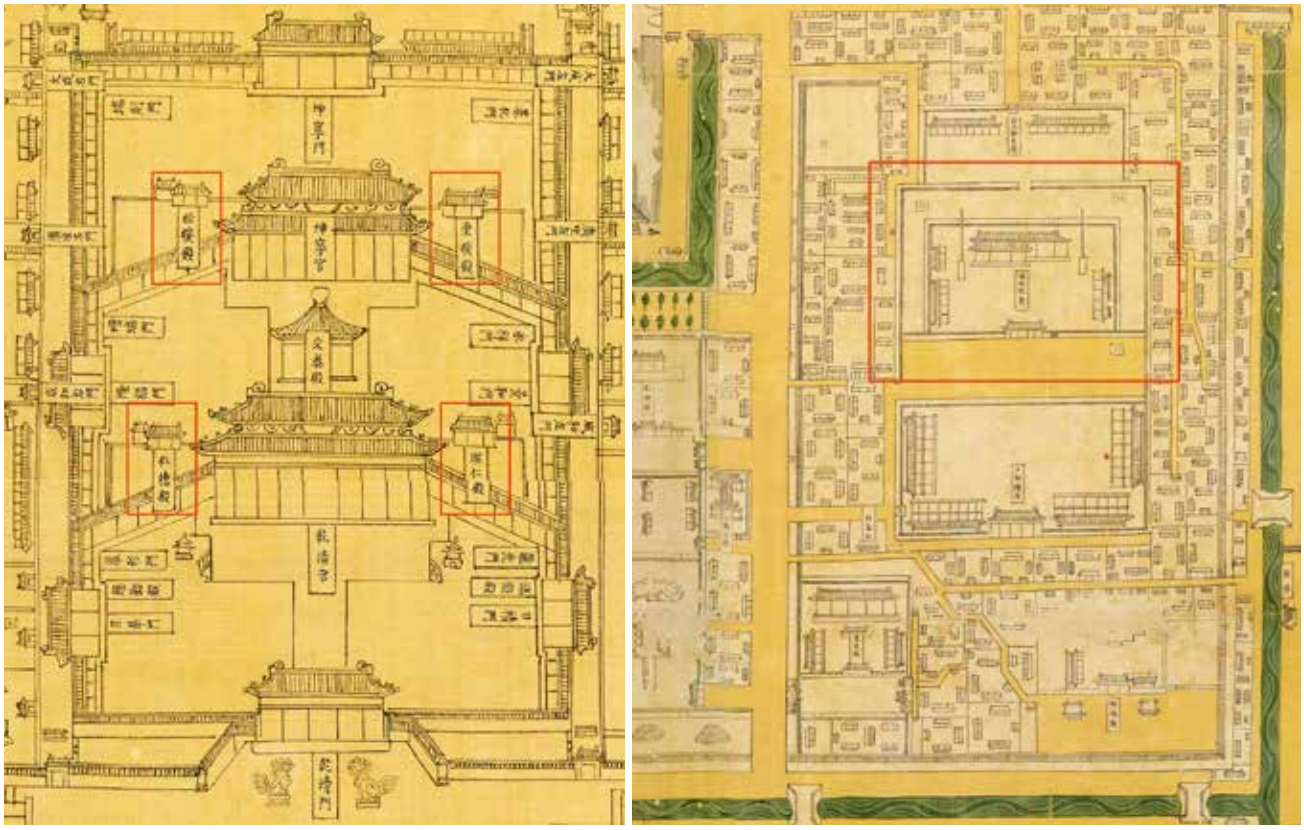


图 9 《皇城图》绘标乾清宫两旁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东西暖殿（左）；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右）

细审《皇城图》，刘先生发现两处文献失实：一是“乾清宫左右之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之东、西暖殿，图中业已绘入，而《日下旧闻考》则谓建于康熙三十六年”[1]110；二是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顺天府志》却称“康熙三十三年建”[1]113（图 9）。

刘先生质疑前者：“考乾清、坤宁二宫，自顺治十二年重建后，至康熙十二年复再予修治，而附属建筑如弘德诸殿，讵至康熙三十六年，始鸠工兴造，恐非事理所有？颇疑此二殿在顺治间，应与二宫同时修复，而《日下旧闻考》所收，系其再修纪录也。”[1]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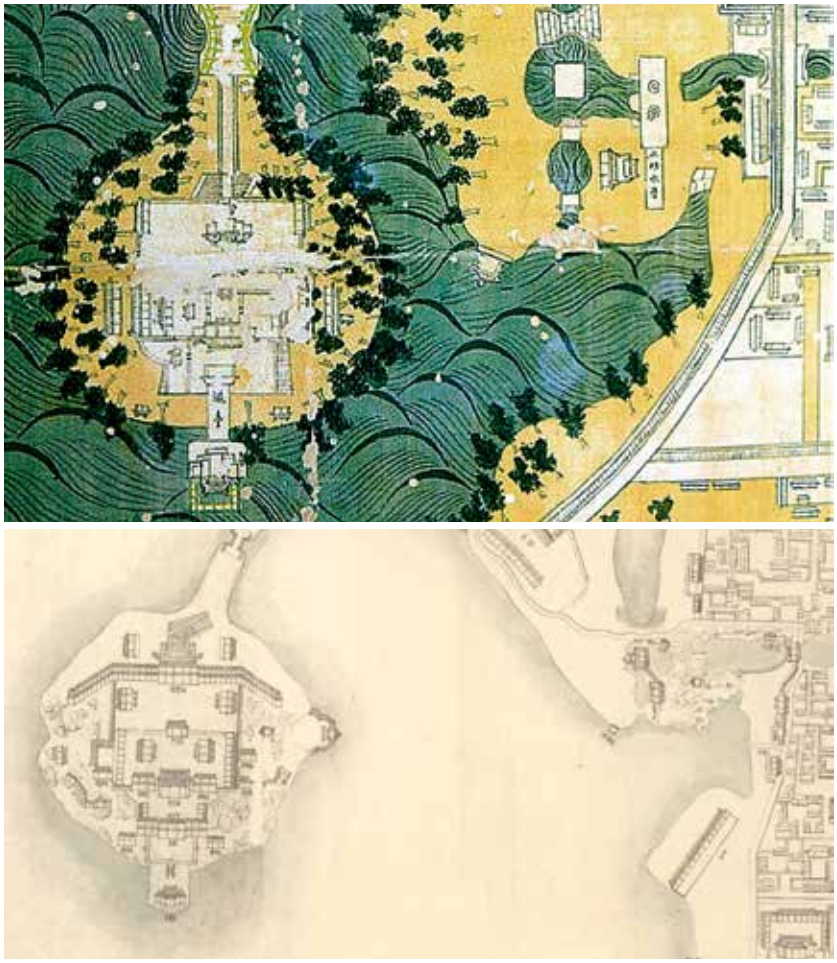


图 10　上：康熙《皇城图》中的瀛台；下：乾隆《京城图》中的瀛台。❶

又辨析后者："康熙三十三年，建吗哈噶喇庙于此，较图中所载大内西苑殿阁年代，约后十余载，为此图极大之矛盾。然《宸垣识略》《燕都丛考》与《天咫偶闻》，俱谓明南内洪庆宫为供奉番佛之所，其地与今庙为近，而庙内犹存成化七年所造佛像。又云吗哈噶喇佛之名，见于《元史·泰定帝纪》，非始于清。其说果确，则康熙三十三年营建此庙，殆因旧扩增，不足为是图年代错误之病。"[1]113

准此，刘先生总结道："综上所述，图中所示之建筑，除吗哈噶喇庙与弘德殿、昭仁殿、东西暖殿之营建年代，尚俟研求外，其余殿阙，大都属于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故图之正确年代，虽遽难决定，然所示皇城宫殿规模，在时间上属于康熙中叶，殆无疑问。"[1]113

最后，又殷殷寄望："异日当详为分析，与乾隆北京地图，互相比较。"[1]113

与此呼应，通览《年代考》，不难发现也不难理解，字里行间，竟然前所未有地大量采用似、假说、恐、疑、确否、待、俟、或、遽难决定、无从查考等词语！这固然映射出刘先生治学严谨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更彰显出他深钻历史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事实上，举例而言，在《皇城图》残损而瀛台部分难辨的情况下，设若刘先生能比勘乾隆北京地图，即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以下简称《京城图》）❷ 中的瀛台（图 10），以核查《年代考》

❶　前者为顺治间格局，后者为康熙十九年（1680）后格局。两相比较可见，后者建筑大规模增华外，还前所未有地从琼岛拆运了大量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在正隆四至六年（1159—1161）辇自汴梁艮岳的太湖石，在瀛台叠置假山。刘敦桢引征《金鳌退食笔记》所述康熙十九年后景物，《皇城图》无见，而皆见于《京城图》。

❷　《京城图》发现、出版与利用历程（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曹睿原、张净妮整理）：

1933 年 6 月—1934 年 12 月	《京城全图》被重新发现，整理前藏造办处舆图房。
1934 年	协和医院委托文献馆"查京城全图内豫王府地址"。首次出现《京城全图》名称和使用记录。
1935 年 10 月 10 日	文献馆《文献特刊》发表《清内府藏京城全图年代考》，发布发现《京城全图》消息。
1936 年 5 月	文献馆编印出版《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收录了残本的信息，首次公布卷轴本消息。
1938 年 12 月	单士元《恭王府沿革考略》最先利用卷轴本进行研究，认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前绘制完成了有关北京都城的科学地图，之后按同样的技术绘制了《清皇城宫殿衙署图》。
1940 年 7 月	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局调查所"编辑新民印书馆出版《乾隆京城全图》，惯称为"日本版"。
1940 年	今西春秋（日）撰《乾隆京城全图解说》。
1940 年 12 月	故宫文献馆出版《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惯称为"故宫本"。
1962—1986 年	1962 年始，徐苹芳主持把《京城图》历史文化信息复制在现代城市地形图上进行历史地图研究。1966 年定稿，收入 1985 年版《北京历史地图集》，1986 年出版《清乾隆北京城图》和《明北京城复原图》。
1984 年	杨乃济发表《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考订图成于乾隆十五年（1740）五月十五日。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3 期。
1996 年 2 月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加摹乾隆京城全图》。以故宫本为蓝本，参考日本版加摹。
2009 年 8 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故宫博物院合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清乾隆内府绘制京城全图》。
2009 年	晋宏逵《〈京城全图〉综述》刊于《清乾隆内府绘制京城全图》"说明书"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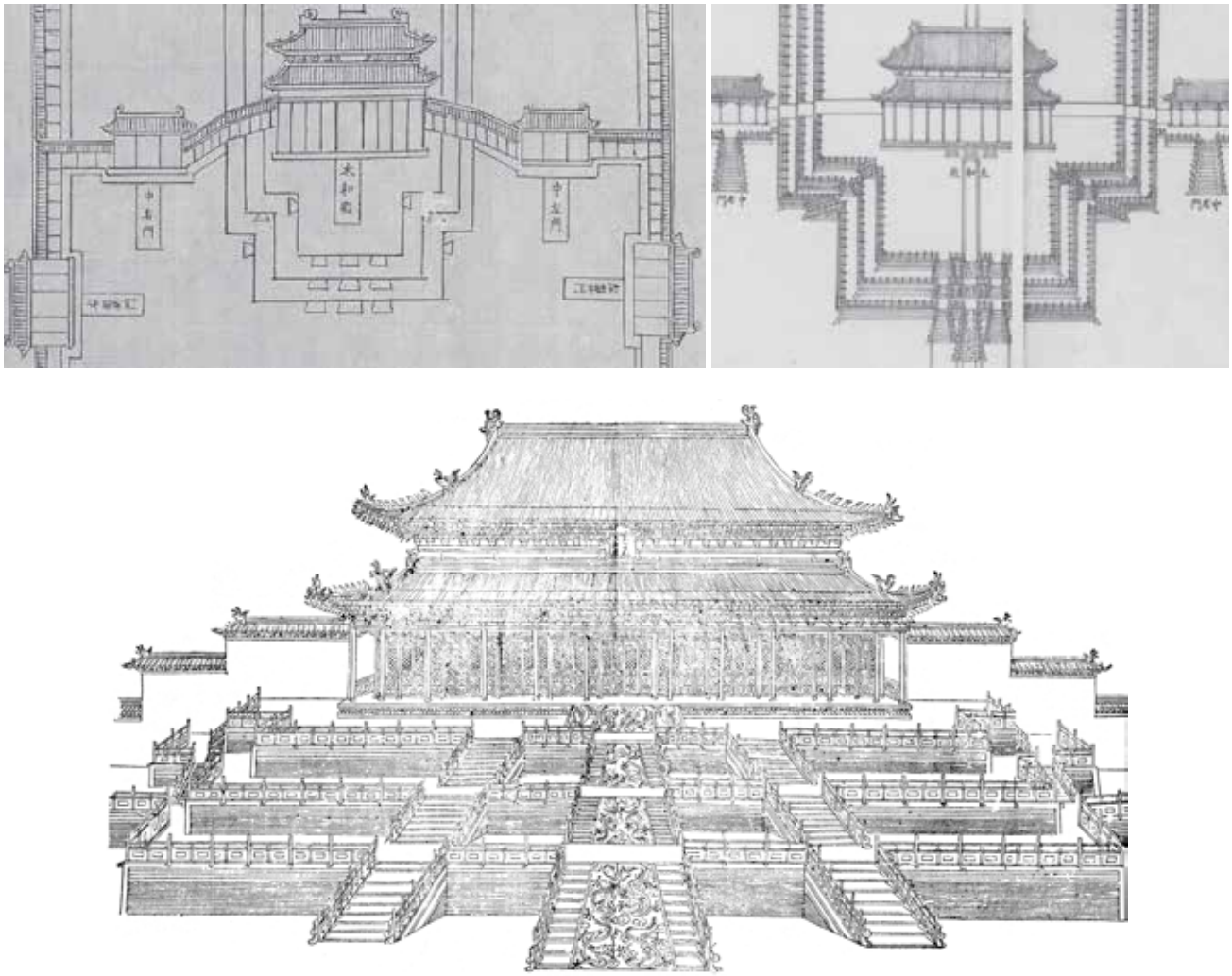


图 11　左:《皇城图》中太和殿为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焚毁前原貌，两翼合抱抄手斜廊；右:《京城图》中康熙三十六年七月重建竣工后的太和殿，两旁已改为四层叠落的防火墙，以防火灾延烧；下：康熙三十六年八月江藻撰《太和殿纪事》中刊印鸿胪寺司宾官禹之鼎绘制的太和殿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提供）

中三引《金鳌退食笔记》的相关载述❶，相信，他必定会把“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1]111 中的“疑”字祛除，进而厘定为：故此图所示，为康熙以前顺治时情状也❷！

更重要的是，对康熙朝大内宫殿，设若刘敦桢先生能够阅检康熙《实录》《会典》以及相关宫廷档案，而非仅限颇多隐讳篡改的《日下旧闻考》或《国朝宫史》等史料，则必能知悉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灾”，即太和殿焚毁❸！再以此审视《皇城图》，太和殿连同两翼抄手斜廊赫然在焉！而乾隆《京城图》，太和殿面目已殊（图 11）！原结论“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1]109，也理应祛“似”改“当”，即：故就大内言，此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以此而论，诸如“康熙十九年改筑后情状”“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或十九年以前”等语，也势必尽皆汰除或厘正，进而结论：《皇城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或“可能”。但历史研究却必须设问“假如”或“可能”，俾能更全面、深入地体认相关史实的语境，真切理解史学前贤的学术成果，揭示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更何况，正如后文《新识》揭橥的那样，

❶　应指出的是，《金鳌退食笔记》“康熙庚申复加修葺，皆易黄屋，复殿重房，交疏对溜，青台紫阁……浮道相通。又于水边堆叠奇石，种植花树，层岩小壑，委曲曼回，蓼渚芦湾，参差掩映。……东有二亭，以棕覆之，隔窗云雾，卷幔山泉，别具幽致。……又作宛转桥出水面，遥望流杯亭，水声树色，不异三山瑶岛。……前作瀛台门楼五间。上日于侵晨临门听政毕，外直讲官于此进讲，高槐拂檐，阶下立涂金异兽二，制作甚精。……左右回廊各三间，上亦有楼，楼外复接小廊，门内东西楼屋各五间，自池东直房改作之”云云，尤其是“又作宛转桥出水面，遥望流杯亭”，强调自此东望，可见在太液尾闾明代旧地新建的流杯亭。凡此景象，皆见于《京城图》而非《皇城图》。

❷　详见后文 6 新识。

❸　见《康熙实录》卷八七：“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甲子，太和殿灾。已卯，太和殿灾，颁诏天下。诏曰：朕躬膺天眷，统御寰区，夙夜祗承，罔敢怠忽，期于阴阳顺序，中外敉宁，共享昇平之化；乃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灾，朕心惶懼，莫究所由，固朕不德之所致欤？抑用人失当而致然欤？兹乃力图修省，挽回天意。爰稽典制，特布诏条，消咎徵于已往，迓福祉于将来。于戏！朝乾夕惕，答上天仁爱之心，锡极绥猷，慰下土瞻依之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康熙《起居注》470 页：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甲子。寅时，太和殿灾。丑时，火自西膳房起，延烧后右门、中右门、西斜廊。寅时，至正殿，复至东斜廊、中左门。至巳时火息。方火起时，上谒太皇太后宫问安。午时，诸王、大臣同谒乾清门，请皇上安，并请皇太子安。”又，康熙《起居注》476 页：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时，上以太和殿灾，颁诏天下”；二十一日“……刑部题太和殿灾，失火六人应绞事、上曰：放火之罪不赦。此等人在禁地，不小心谨慎，致此大变，虽已遇赦，不容宽免，仍依议治罪”。

刘敦桢先生拘囿时局而未能检阅的史料证明，他对《皇城图》的整体判释和《年代考》引征史料的深度质疑，以及对未来致力方向的理性推断，都是极为精当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5 歧义

刘敦桢《年代考》发表半年后，即 1936 年 6 月，青年才俊、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偰（图 12）❶在南京完成《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下称《图考》），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面世（图 13）[5]❷，书中涉及《年代考》，深为认同，但也对个别考释提出了异议。

不同于《年代考》旨在考订《皇城图》制成时间，朱偰《图考》则如其续编《北京宫阙图说》强调[6]：因日寇侵临北平，出于救亡图存的挚忱，试图殚尽个人长技，抢救性展开古都宫殿、苑囿与寺庙、陵寝勘察、摄影记录和研究，撰著“故都纪念集”三种传世❸。

在《图考》绪论中，朱偰不吝篇幅，针砭载纪都城诸书大量阙谬、隔阂实制沿革之弊，以其“生长燕京，二十余年，宫廷苑囿，无不遍览，自信对于实地考察方面，尚有一日之长”，“故不揣个人学力之渺小，图书设备之不足，毅然肩此重任……期以清晰之系统，精审之图绘，叙述故宫之沿革”。[5]

第一章论明代建置即永乐朝至李自成焚毁大内各主要建筑，第二章叙崇祯朝的皇城、禁城、宫苑及内府衙门建设与位置，第三章述清代建置，清初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修复期，此后至乾隆六十年（1795）为增建期，嘉庆元年（1796）至清末为守成期，第四章言中华民国以来的兴废。第二章尤其是第三章，则直接涉及《皇城图》及《年代考》。

一如刘敦桢，《皇城图》之精细翔实及重大价值，深令朱偰青睐；在相关典章、档案等备战南迁的困境下，仍勉力勾稽史籍，比勘《皇城图》和对应实物遗存，所引文献甚至略胜年长十岁的刘先生。然而不同于刘敦桢可以细审《皇城图》，该图既已装箱南运，朱偰只能检阅相关照片乃至《年代考》照片印本，不少细节模糊（图 14），难免抱憾喟叹❹。

对《年代考》，朱偰深表认同，评介《皇城图》内容、价值，就援自其中。对刘先生再三申明文献与图抵牾的质疑，还另引文献补苴。略如：“吗哈噶喇庙……实远起于元。《元史·泰定帝纪》；至治三年十二月，塑马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梵书》言吗哈噶喇佛有十二，皆文殊观音化身，及护法神也。及明，此种佛像移置重华宫东长街洪庆殿。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云：‘自东上南门之东，曰重华宫……东长街则有……洪庆门洪庆殿，供番佛之所也。’按其地即今之吗噶喇庙，余尝亲至其地。然则明洪庆殿番佛，盖元泰定遗制。而吗哈噶喇庙之名，亦不必始于康熙三十三年，特当时名吗哈噶喇庙，今日简称吗噶喇庙（《顺天府志（十三）》），可见此图去古未远也。”[5]

图 12　朱偰（1907—1968）

图 13　194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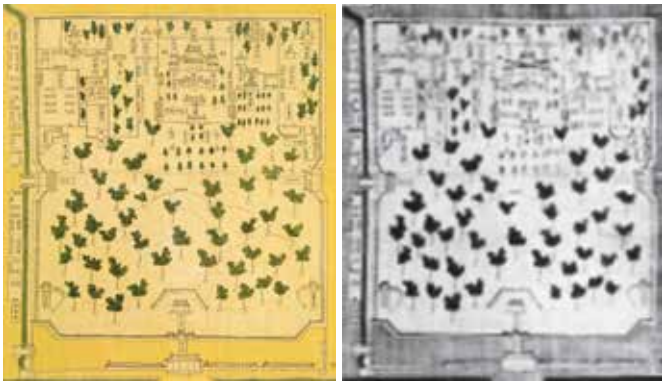


图 14 《皇城图》景山部分比较　左：刘敦桢研判原图；右：朱偰资用《年代考》图版模糊一片

❶　朱偰（1907—1968）为现代中国史学及教育体制奠基者朱希祖（1879—1944）长子，自幼深受父亲影响，酷爱文史，就读北京大学政治系及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期间，皆辅修史学。1932 年受聘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翌年任系主任，仍一如乃父，钟情结合文献研究查勘历史遗迹及摄影，传世著作丰赡，贡献巨大。

❷　朱偰《图考》云“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偰序于青溪”；商务印书馆初版《图考》版权页署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1947 年《图书季刊》新第八卷第一、二合期 48 页评介《图考》谓“书成于二十五年，今始出版”。

❸　《北京宫阙图说·自序》：建国二十一年（1932）夏，余归自西欧，时辽东失守，幽燕垂危……又历三年，蓟北风云日亟，故都文献，有不保之虞；重以六月二十八日事变，益增北征之志。盖北京故宫，为明清两代六百年来大内之地；而城内外坛庙寺宇陵寝，又为辽金元明清五朝文物制度所系。设一旦而不幸罹劫灰，而文物荡然……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与此文物而长存。因于二十四年（1935）七月，重来北平……计穷二月之力，在京城内外摄影五百余幅。……余既写《元大都宫殿图考》及《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因复辑《北京宫阙图说》，为故都纪念集第三种问世。

❹　《图考·序》称：“余昔在北平图书馆，得见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既又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得见乾隆京城地图，比较二图，参证群书，因得明清以来建置沿革。”书中屡以文献较比《皇城图》，唯及图中的景山，叹云：“因字迹模糊，而制版又不甚清晰，故不可考。”以此对照中国园林博物馆购藏 1934 年学社摄《皇城图》局部照片，恰恰阙佚景山！或可见朱偰所用图像除景山部分不得已阅检《年代考》图版，主要依据学社拍摄局部照片。事实上，朱偰与学社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如 1937 年 6 月《汇刊》第 6 卷第 4 期就有王璧文评介朱偰著《辽金燕京城廓宫苑图考》及《元大都宫殿图考》；而刘敦桢《年代考》外，朱偰《图考》还屡引《汇刊》各期单士元编《明代营造史料》。准此，学社发售古建筑照片及图版（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6 卷第 4 期，第 186 页），朱偰应曾购买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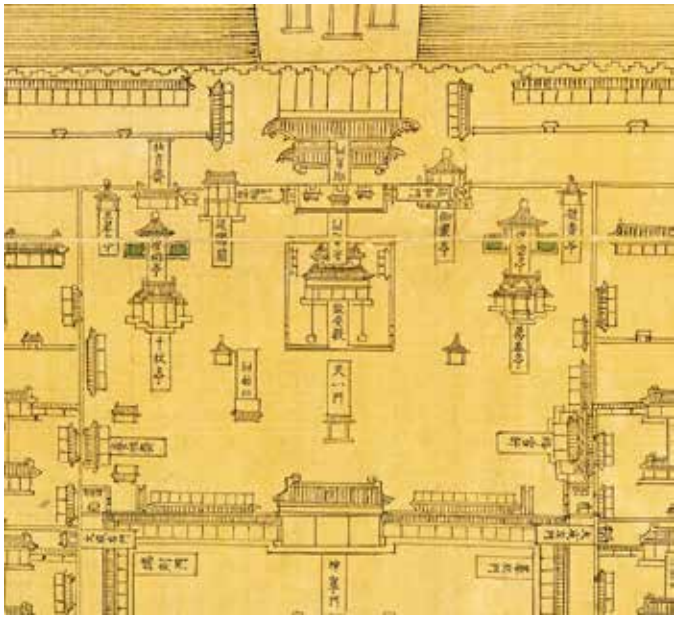


图 15 《皇城图》中的御花园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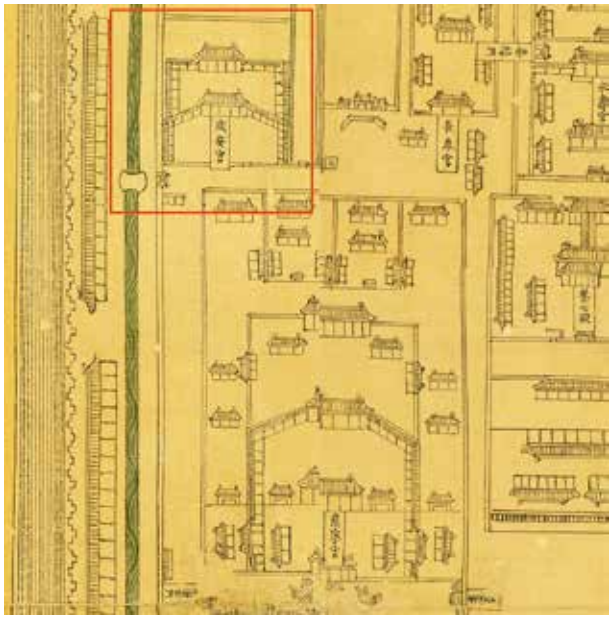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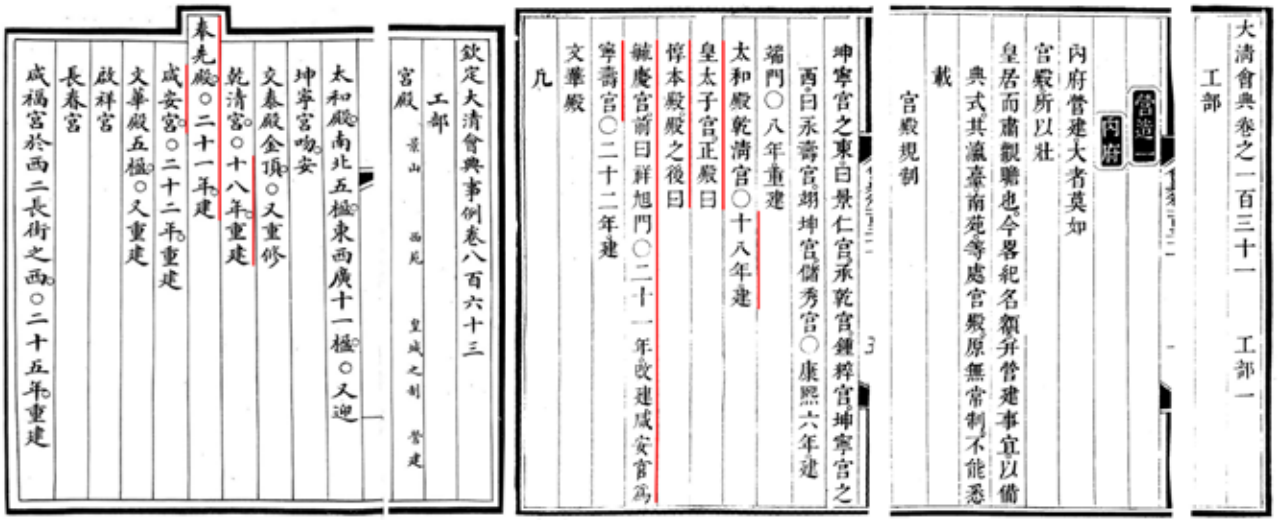


图 16 《皇城图》中的慈宁宫（下）和咸安宫（上）❷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三
工部
宮殿 景山 西苑 皇城之制 營建
太和殿南北五楹東西廣十一楹○又迎
坤寧宮吻安
文泰殿金頂○又重修
乾清宮○十八年重建
奉先殿○二十一年建
咸安宮○二十二年重建
文華殿五楹○又重建
啟祥宮
長春宮
咸福宮於西二長街之西○二十五年重建

大清會典卷之一百三十一 工部一
工部
營造一
內府
內府營建大者莫如
宮殿所以壯
皇居而肅觀聽也今畧紀名額并營建事宜以備
典式其瀛臺南苑等處宮殿原無常制不能悉
載
宮殿規制
坤寧宮之東曰景仁宮承乾宮鍾粹宮坤寧宮之
西曰永壽宮翊坤宮儲秀宮○康熙六年建
端門○八年重建
太和殿乾清宮○十八年建
皇太子宮正殿曰
惇本殿殿之後曰
毓慶宮前曰祥旭門○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宮爲
寧壽宮○二十二年建
文華殿
凡

图 17 左：光绪《会典事例》载（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右：康熙《会典》原文为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另康熙《会典》明言（见图 8）：“慈宁宫在武英殿后以奉太皇太后，宁寿宫在慈宁宫西北以奉皇太后。”是此宁寿宫在咸安宫旧地！）

在细致研求中，朱偰发现多处细节在《年代考》中未遑涉及。如“御花园……该图尚无摛藻堂”[5]（图 15）；另如“该图紫禁城西偏，已载有咸安宫；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5]（图 16）。

就咸安宫一事，朱偰对《年代考》提出己见，尤其是《皇城图》成图时间：“刘君断定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所绘，尚有问题。……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建咸安宫。然则该图之制定，当在康熙二十一年。”[5]

遗憾的是，囿于时局，朱先生无缘核检这一引自光绪《会典事例》的关键史料，原出嘉庆《会典事例》，并未遵依康熙《会典》原文“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图 17）！

这样一来，朱先生判定《皇城图》康熙二十一年（1682）制成的依据，显然难以成立。

事实上，稽考文献可知，咸安宫原为未遭李自成火劫的明代遗构，康熙继统后，成为孝惠皇太后居所，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又称“宁寿旧宫”，此后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大内曾有“宁寿旧宫”与“宁寿新宫”并存的一段特殊历史，前者是禁城西偏旧咸安宫改建的宁寿宫，后者则是在禁城东部新建的宁寿宫❸。其

❶ 朱偰注意到其中尚无摛藻堂。
❷ 咸安宫与南面慈宁宫的主殿，均带有合抱两翼的抄手斜廊，显现出明代宫殿建筑的基本特征。
❸ 参见康熙《会典》卷 131“（康熙）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另见康熙《起居注》，同年十二月癸巳（二十日）“都察院议工部修造宁寿宫销算浮多”，康熙往观“工程俱属坚固”，也正指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此后，康熙《实录》卷 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辛丑（初八日）上谕大学士、内务府总管等：朕因皇太后所居宁寿旧宫历年已久，特建新宫，比旧更加弘敞辉煌，今已告成，应即恭奉皇太后移居。可传谕钦天监敬谨选择吉辰，礼部详考典礼以闻”。“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丑（初三日），以次日皇太后移居宁寿新宫，遣都统化善告祭太庙。丙寅（初四日）未时，皇太后移居宁寿宫，仪仗全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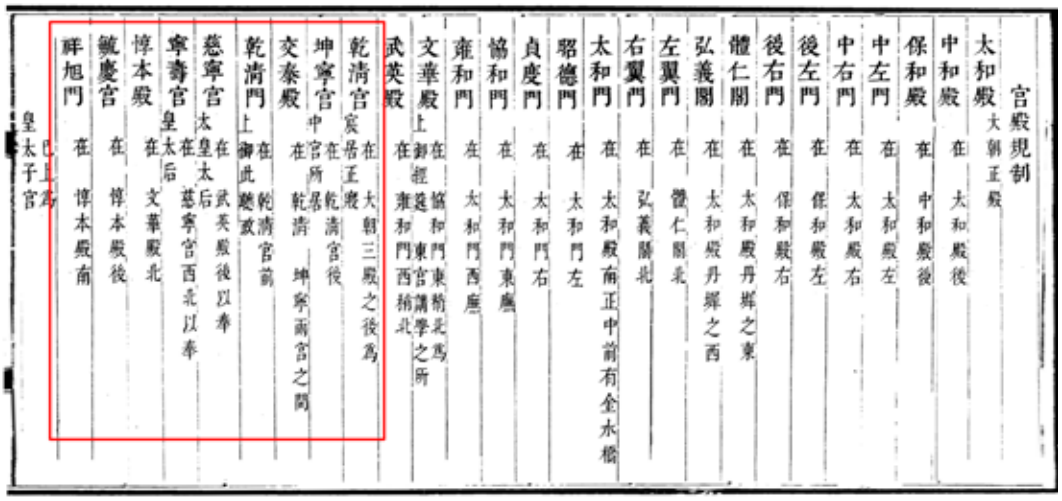

宫殿規制
太和殿 大朝正殿
中和殿 在 太和殿後
保和殿 在 中和殿後
中左門 在 太和殿左
中右門 在 太和殿右
後左門 在 保和殿左
後右門 在 保和殿右
體仁閣 在 太和殿丹墀之東
弘義閣 在 太和殿丹墀之西
左翼門 在 體仁閣北
右翼門 在 弘義閣北
太和門 在 太和殿南正中前有金水橋
昭德門 在 太和門左
貞度門 在 太和門右
協和門 在 太和門東廡
雍和門 在 太和門西廡
文華殿 在 協和門東稍北爲上御經筵東宮講學之所
武英殿 在 雍和門西稍北
乾清宮 在 大朝三殿之後爲宸居正寢
坤寧宮 在 乾清宮後中宮所居
交泰殿 在 乾清 坤寧兩宮之間
乾清門 在 乾清宮前上御此聽政
慈寧宮 在 武英殿後以奉太皇太后
寧壽宮 在 慈寧宮西北以奉皇太后
惇本殿 在 文華殿北
毓慶宮 在 惇本殿後
祥旭門 在 惇本殿南
皇太子宮 已上爲

图 18　康熙《会典·宫殿规制》所记内廷规制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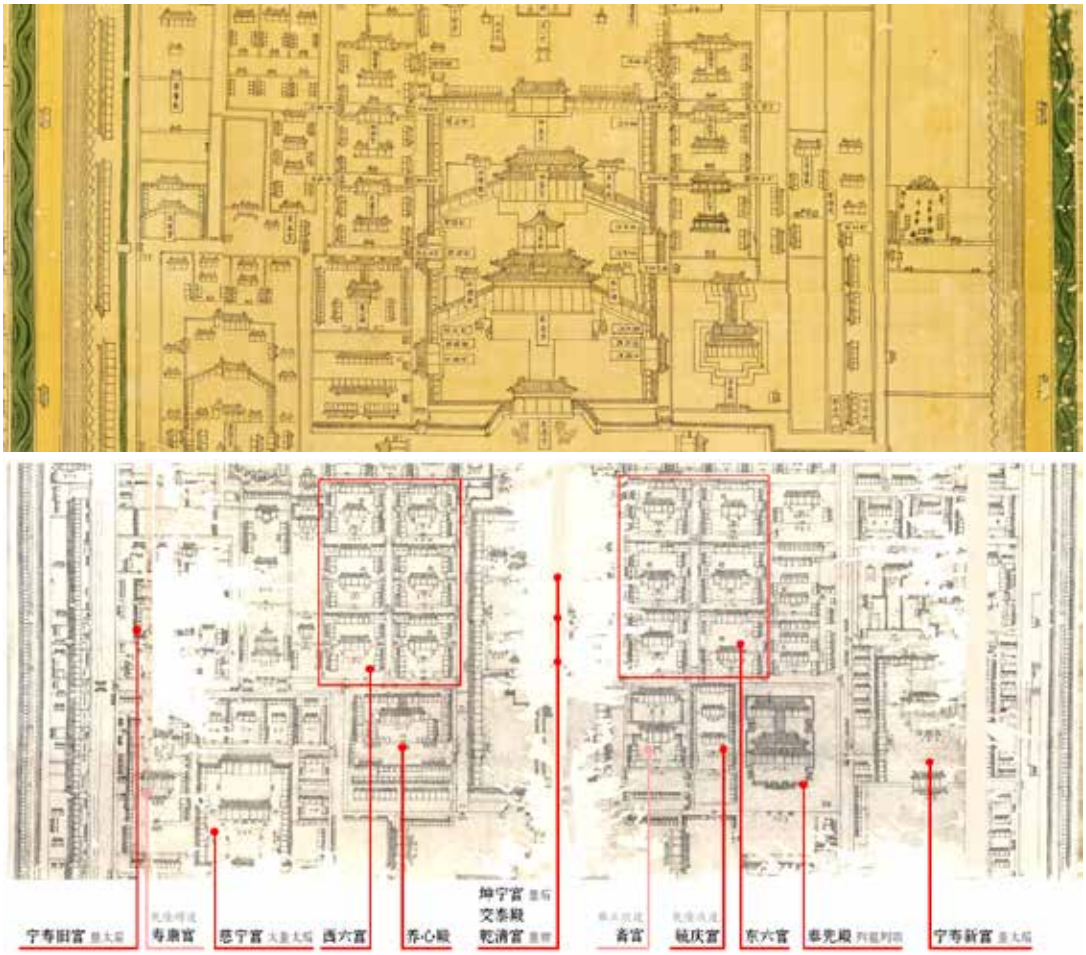


图 19《皇城图》（上）和《京城图》（下）内廷建筑格局迥异（并见图 20、图 21❷）

原委，容后文《新识》陈述。

与此直接关联的是，刘敦桢《年代考》曾指出："惇本殿、毓庆宫康熙十八年建……与图核校，则……内廷东路之毓庆、延禧、永和、景阳诸宫，及西路之启祥、咸福二宫，皆缺而未载。"[1]109 对此，朱偰另持异议："若谓毓庆宫、惇本殿，建于康熙十八年，何以该图尚未载入，不知毓庆宫在嘉庆以前，为未婚皇子所居之偏宫，本无关宏旨，未足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一说之根据也。"[5]

然而，勿论朱偰先生为何回避与此关联的东、西六宫的建置，也毋庸赘引其时无可获检的大量文献档案，仅以康熙《会典》有关毓庆宫的记载（图 18），比较《皇城图》和《京城图》迥然不同的布局（图 19～图 22），朱先生的

❶　不同于顺治朝力图承袭明代规制以标举代明行政合法正统的旧局面，康熙中叶改造完善后的新貌，明确彰示了新朝推崇孝治天下理念的内廷统序关系，成为明清内廷格局前所未有的变革。

❷　典型如《皇城图》中奉先殿西尚无康熙十八年（1679）后增建的毓庆宫及斋宫等，却皆见《京城图》（红线标示各建筑）。为增添这些建筑，先期重建的奉先殿，院落西侧大幅收窄，已非轴线对称，原来的三层月台也改建为一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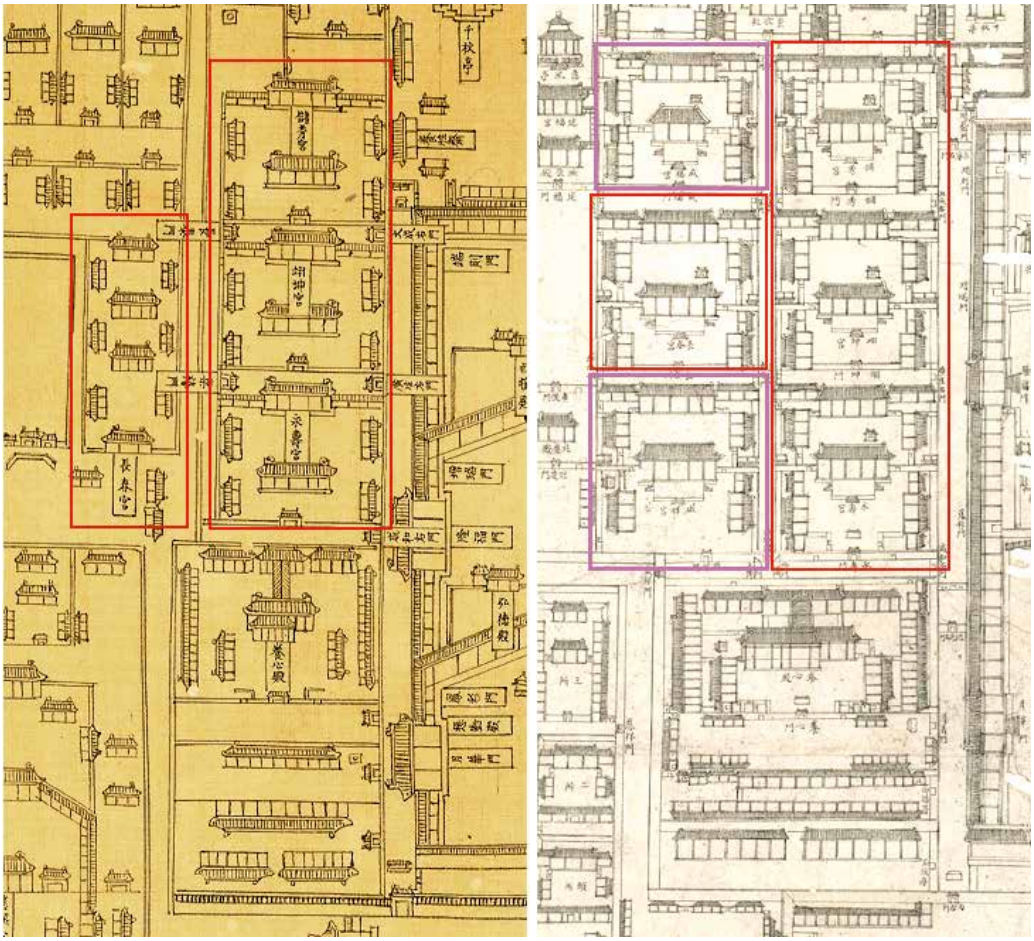


图 20　康熙初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宫的变革
左：皇城图❶；右：京城图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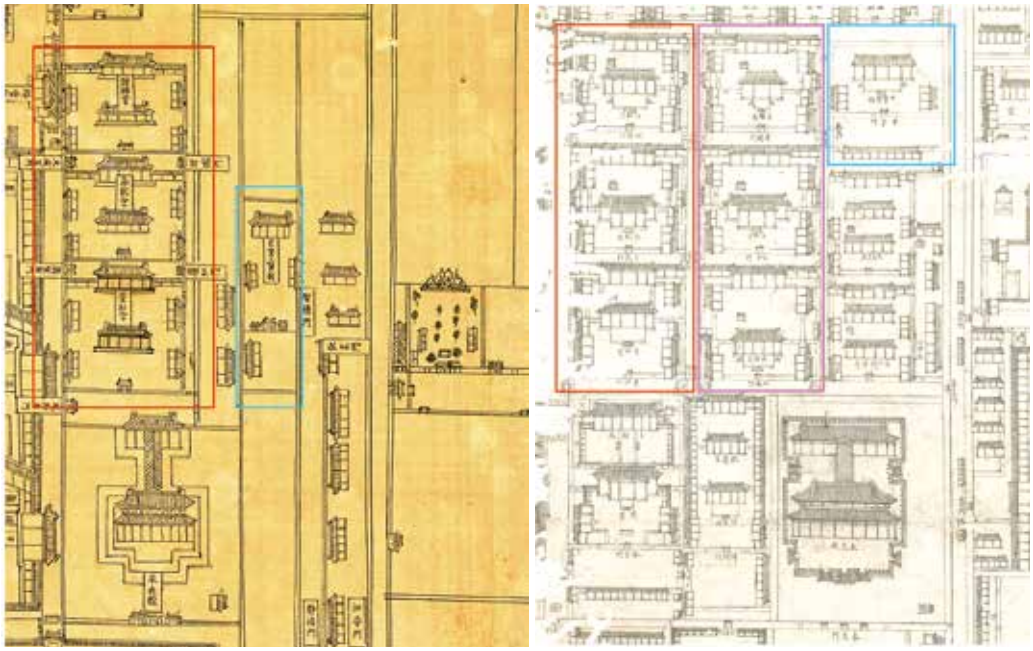


图 21　康熙初年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后宫的变革❸
左：皇城图；右：京城图

误判显而易见。

其实，朱偰《图考》系统比较自明代到清初的宫殿格局，曾敏锐觉察并强调："顺治一代，规制草创，修复宫室，首重观瞻。""清初以修复明代规模为事。"甚至提到"至若康熙十八年建毓庆宫、惇本殿，则已轶出前朝规模！"[5] 惜因匮缺可稽典章和档案，终未洞察并深究这"轶

❶ 《皇城图》中内廷西路有顺治初供大臣之子读书的明代遗存长春宫和其东侧顺治十二年（1655）建永寿、翊坤、储秀宫。尚无启祥、咸福宫，西六宫格局尚未形成。
❷ 《京城图》中有康熙二十二年（1682）以后长春宫添建前后配殿，增建启祥、咸福宫，形成西六宫格局，至乾隆十五年（1750）未曾大变。
❸ 《皇城图》与《京城图》对比可见，康熙二十五年（1685）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前，内廷东路仅顺治十二年（1655）建承乾宫、景仁宫、钟粹宫，尚未形成东六宫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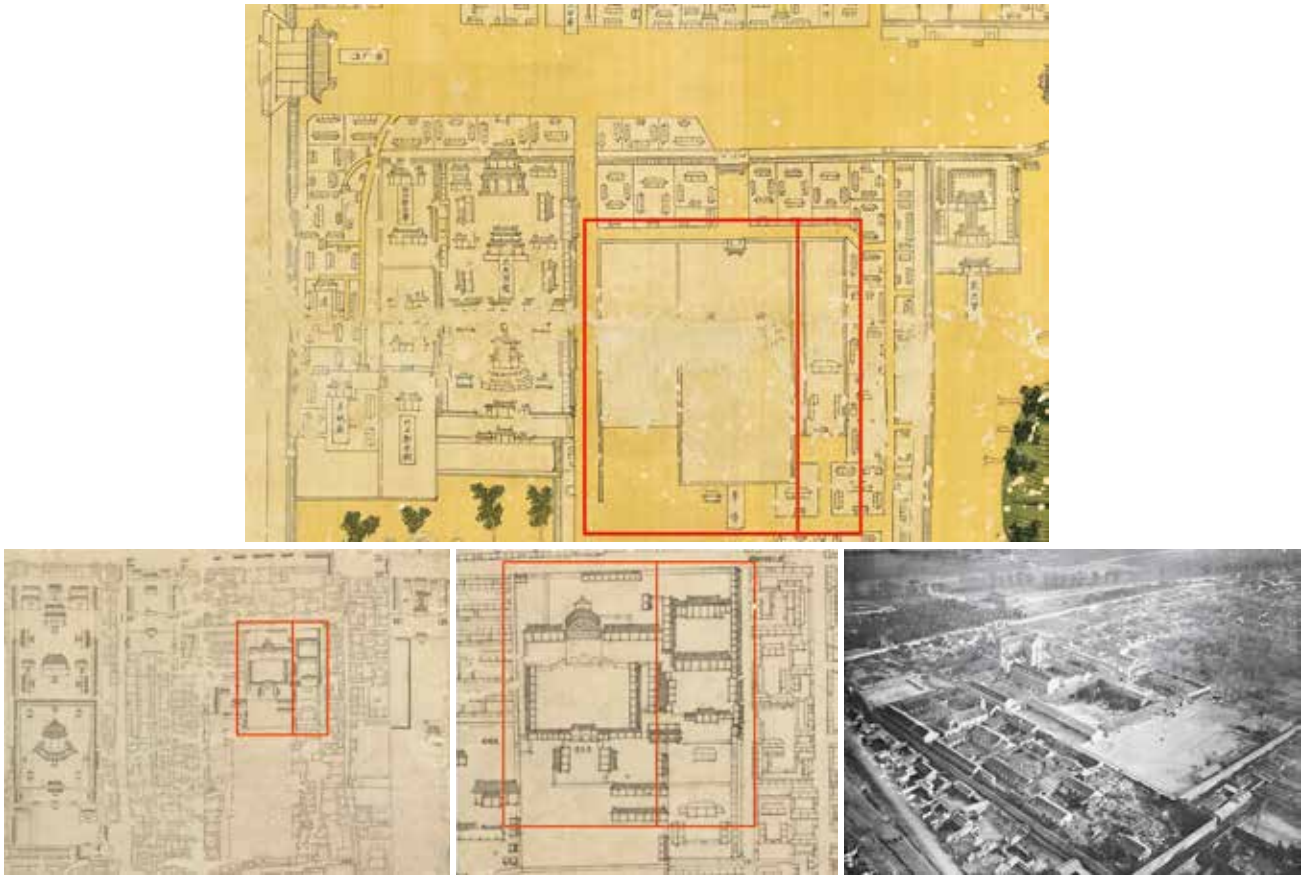


图 22　上:《皇城图》中永乐旧邸仁寿宫故址（左红框）和苏克萨哈府邸（右红框）❶；下左及下中:《京城图》中的蚕池口天主堂（左红框）及住院（右红框）❷；下右:1900 年北堂照片

出前朝规模”之举，竟是内廷建筑大变局的先声❸：随着国家统一，战乱平息，社会安定，志向远大的康熙，投入宫苑尤其大内建设，不同于顺治延续胜朝旧制以标举其代明行政❹合法道统的取向，着力践行新朝推崇“孝治天下”的理念，彰显皇室严格统序的规划意象随之便在内廷建筑的布局中清晰显现出来。

此外，刘敦桢《年代考》注意到，在西苑紫光阁和大光明殿之间，“草场北，明万寿宫故址，图仅作空地一片，知其时犹未修复。”[1]111 朱偰《图考》就此推测：“然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后，未言其灾，《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熙后，一眼其沦为草厂柴阑❺，与李自成焚大内不无关系。”[5] 后文重申：“草场北作空地一片，盖已焚毁，然……万寿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以

❶　永乐旧邸仁寿宫曾屡经嘉靖增修并易名永寿宫、恩寿宫、万寿宫，隆庆间（1567—1572）拆除，废为草场柴阑。

❷　北堂住院原为苏克萨哈府，康熙三十二年（1693）赐给效力宫中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天主堂基址为《皇城图》中的草场，康熙三十三年（1694）赐建教堂，即显赫中外的北堂，直到清末拆迁到西什库。

❸　如图 17 截康熙《会典》谓“康熙十八年建皇太子宫，正殿曰惇本殿，殿之后曰毓庆宫，前曰祥旭门”；图 18 录康熙《会典》云“惇本殿在文华殿北，毓庆宫在惇本殿后，祥旭门在惇本殿南”；是知刘敦桢、朱偰先生所研讨的毓庆宫、惇本殿也叫皇太子宫。康熙《起居注》、《内务府满文红白本档》称东宫、太子宫，《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则统称毓庆宫。从这些文献（包括康熙《御制文集》、乾隆《会典则例》及光绪《会典事例》）可以知道，太子宫即毓庆宫、惇本殿，康熙十七年（1678）曾同奉先殿一道简派工部官员启动修造。原来奉先殿内列祖列宗神牌，也在十八年（1679）迁至太庙中殿各寝室。旋因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大地震后修葺工费巨大，接踵十二月三日太和殿焚毁，加上剿征三藩之乱度支浩繁，太子宫兴建暂停。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一月重修奉先殿告成，转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修复西苑白塔工竣，二十二年（1683）重建文华殿、启祥宫并添造长春宫、咸福宫前后配殿，二十四年（1685）文华殿东兴建传心殿等先后完工后，该太子宫即毓庆宫才在二十五年（1686）最后落成，皇太子、大阿哥、三阿哥居之（详见本文下《新识》）。至于太和殿被焚后，因宫内可供居住理政的宫殿尚多，更延至三十四年（1695）兴工，三十六年（1697）完竣。仅就内廷格局看，按祖宗到皇太子统序第次建造，秩序景然。

❹　略如顺治《实录》：顺治十二年四月癸酉（十九日），工部奏言：前有旨，命乾清宫、坤宁宫两傍俱照明朝旧制，各造斜廊、石房三间，乾清门两傍各石房一间。今钱粮不足，侥造斜廊、石房，恐工多费繁，致误乾清等宫殿之工；又铜铁亦难采办，此斜廊石房工应行停止。其原估所备木植修理斜廊。从之。

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戊戌（二十五日），谕礼部：朕考往代典制，岁时致享，必于太庙；至于晨昏谒见、朔望荐新、节序告虔、圣诞忌辰行礼等事，皆另建有奉先殿。今制度未备，孝思莫伸，朕心歉然。尔部即察明旧典具奏。

顺治十七年三月辛未（十六日），谕礼部：奉先殿祀太祖太宗神位，未及并祀四祖，于朕孝思未展。今详稽旧制，岁终祫祭之外，有奉先殿祫祭之礼。以后元旦、皇太后万寿及朕寿节俱照例祭告；奉太庙后殿四祖神主于奉先殿，与太祖太宗合享，位次照太庙祫祭礼。其应行事宜，尔部即详议具奏。

顺治十七年五月壬申（十八日）谕工部：奉先殿享祀九庙。稽考往制，应除东西夹室行廊，中建敞殿九间，斯合制度。前兴造时，该衙门未加详察，连两夹室止共造九间，殊为不合。今宜于夹室行廊外，中仍通为敞殿九间，以合旧制。尔部即会同宣徽院详议，并选择兴工日期具奏。

顺治十七年九月壬申（二十日），巡视光禄户科给事中胡悉宁、福建道御史胡文学奏言：旧制，外来远人俱赐宴于阙左门；今改宴礼部，诚为非体。宜修明旧制。下所司议。

❺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言其闻见云：“万寿宫在西安门内迤南，大光明殿之东。成祖潜邸也。殿东西有永春、万春诸宫，翼而前，为门者三。或曰即旧仁寿宫。明世宗晚年爱静，常居西内。今朱垣隙地杂居内府人役，间艺黍稷及堆官柴草。南曰草厂，北曰柴阑云。”

后，未言其灾，然则终明之世，万寿宫尚无悉也。《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照后，已言其沦为草厂柴阑，然则万寿宫之毁，其在明末清初，李自成焚大内之际乎？”[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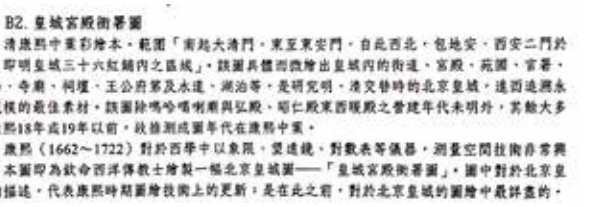
其实，在朱偰先生曾引征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就已明确指出：“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于其地……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至穆宗绍位，不特永寿宫夷为牧场，并西苑督农大臣，亦立裁去矣。”[7] 以此而论，将该草厂柴阑咎由，推测为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四月二十九日夜，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西遁”[5]，显然是疏忽误判。

《图考》等古都纪念集，成于国家存亡之际。朱偰称他自宁赴京查勘、摄影为北征：“夫士既不能執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与此文物而长存。”[5] 正因此，阅览《图考》，纵有微瑕，也不能不为充盈其文中的“慷慨赴义之志气”和过人才情慑服。

继朱偰先生《图考》后，时隔 72 年，即 2008 年 7 月，《皇城图》在台北故宫“院藏古舆图特展”现身公众，辅有导览手册《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概略介绍了该图内容并扼要予以评价（图 23）。

两段简略文字，第一段显然参考了刘敦桢先生的《年代考》，然而文中两度申言“康熙中叶”，比对前文“发现”“诠读”，凡最初整理编目，嗣后《年代考》，反复强调“清初画本”“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清初极重要之史料”“图中……尚沿用清初旧名”“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等等，言“此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也殊非康熙中叶，而是中叶以前，也就是康熙初年！

既然《皇城图》成图在清初康熙中叶前，导览第二段文字中诸如西学、仪器、测量空间技术，尤其是“本图即为钦命西洋传教士绘制的一幅北京皇城图”“代表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云云，也就不能成立。浏览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的著述，翻阅中国地图史和测量史的专著[8]，就可知道，“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其实都发生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后，即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精通当时西方科技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等六名“国王数学家”来华后❶！



B2. 皇城宫殿衙署图

清康熙中重彩绢本，範圍「南起大清門，東至東安門，自北西北，包地安，西安二門於內，即明皇城三十六紅鋪內之區域」。該圖具體而微繪出皇城內的街道、宮殿、苑囿、官署、倉場、寺廟、河壩、王公府第及水道、湖泊等，是研究明、清交替時的北京皇城，進而追溯永樂規模的最佳素材。該圖除鳴鸞、鳴和、鳴玉、鳴鑾與弘殿、昭仁殿東西暖殿之營建年代未明外，其餘大多是康熙18年或19年以前，故推測成圖年代在康熙中葉。

康熙（1662～1722）對於西學中以象限、望遠鏡、對數表等儀器、測量空間技術非常興趣。本圖即為欽命西洋傳教士繪製一幅北京皇城圖——「皇城宮殿衙署圖」。圖中對於北京皇城的描述，代表康熙時期圖繪技術上的更新，是在此之前，對於北京皇城的圖繪中最詳盡的。

图 23　2008 年 7 月《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一书对《皇城图》的介绍

这和前文对刘敦桢、朱偰有关《皇城图》在康熙十八年（1679）前成图的讨论，当然抵牾。

况且，审视《皇城图》绘制技艺，诚如刘敦桢所谓“墨线界画”，一派浓烈的中国传统韵味，迥别当时西式地图，而且无比例！也未见中国古代制图六体的“分率”、计里画方或平格方法❷！凡此，从前文《皇城图》比对《京城图》的图 10、图 11、图 19～图 22，都历历可见。为核验之，笔者所在团队还曾就此按相关文献中的数据量测《皇城图》，并将《皇城图》与《京城图》以及现代相关地图比对，结果发现《皇城图》中各主要建筑宽深和彼此间距率多写意，也确实未按比例绘制（图 24）。

总之，导览文字不多而错误不少，或因筹展繁忙所致？期间，从历经坎坷、自古都北京流转台北故宫的逾千件珍稀古舆图中，审慎遴选出《皇城图》，毕竟属于慧眼，况且将之公开展陈，服务社会，更是功莫大焉！

值得指出的是，十年后，即 2018 年 12 月，台北故宫的学者们在新出版的《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中再次选刊《皇城图》，采用了刘敦桢先生《年代考》的成果，而《笔画千里》导览文字中的瑕疵则被完全剔除（图 25）！

文中还提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孙果清刊于《地图》2010 年第 2 期的《清康熙年间实测：〈北京皇城地图〉》，却没有采信其中的只言片语，其原委略可辨析如下。

孙果清的文章开篇说道：“《北京皇城地图》，原为清内阁大库旧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文物南迁以前，一直收藏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笔者……见过此地图的黑白照片，图书馆目录中题为《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大概是自清内阁大库移交于图书馆后沿用旧称吧。”[9]

嗣后介绍了该图的质地、色彩、大小、绘制特点和图中所涉内容。篇末提到：“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绘制年代以及绘图人。该地图应绘制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即清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89—1700）之间。……推断这幅《北京皇城地图》绘制于清康熙中期。”[9] 结尾时则强调：“精确地表示了当时北京皇城的规模和布局……是清《乾隆京城全图》之蓝本。”[9]

或因文章旨在普及介绍而非考据，作者并未讲求严谨，以致夺讹殊多。对比前文相关内容可知，所云图名《北京皇城地图》衍“地”字，《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衍“北京”。而所谓“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不啻将王庸先生编目“皇城宫殿衙署图……旧目称［北京皇城图］，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10]55 抹杀！至于《皇城图》绘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绘制于清康熙中期”，

❶　法王路易十四特派“国王数学家”白晋等耶稣会士，1688 年 2 月 7 日抵京，3 月 12 日入宫谒见康熙并敬献相关仪器和图书。

❷　西晋裴秀（224—271）《禹贡地域图·序》总结地图绘制基本原则即“制图六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所谓“分率”，实质就是当代制图（地图，工程设计图等）理论所谓的“比例”——图中图形与实物的线性尺寸之比。“制图六体”曾被唐代贾耽、宋代沈括、元代朱思本和明代罗洪先等杰出学者推崇和继承。康熙二十九年（1690）著名学者胡渭参与《大清一统志》编纂和地图绘制，为诠解古代地理学元典《禹贡》撰《禹贡锥指》，康熙三十六年（1697）成书，康熙四十三年（1703）敬献康熙，被赐赠御书诗扇并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该书指出：地图画方即“计里画方”实源自上古“井田制”；对裴秀的制图六体首推“分率”，强调“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就是说按比例画方。而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降，清代哲匠样式雷世家承袭传统“平格”方法，用于工程计量勘测和制图，其操作基础也正是按比例画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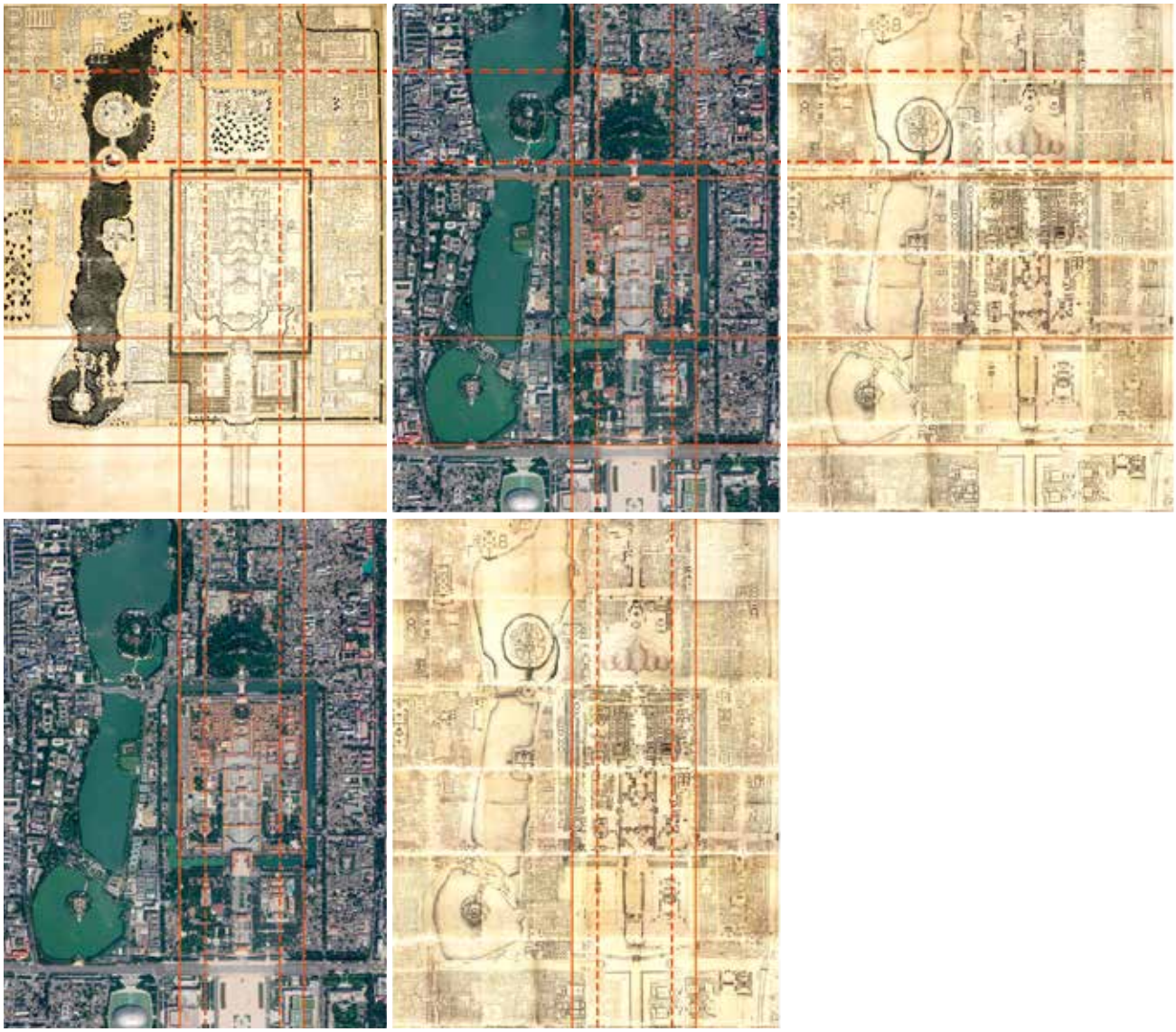


图 24 《皇城图》（上左）与《京城图》（上右、下右）比例分析

图 25 台北故宫 2018 年 12 月出版《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书影 左：封面；中：133 页皇城宫殿衙署图及简介；右：133 页局部简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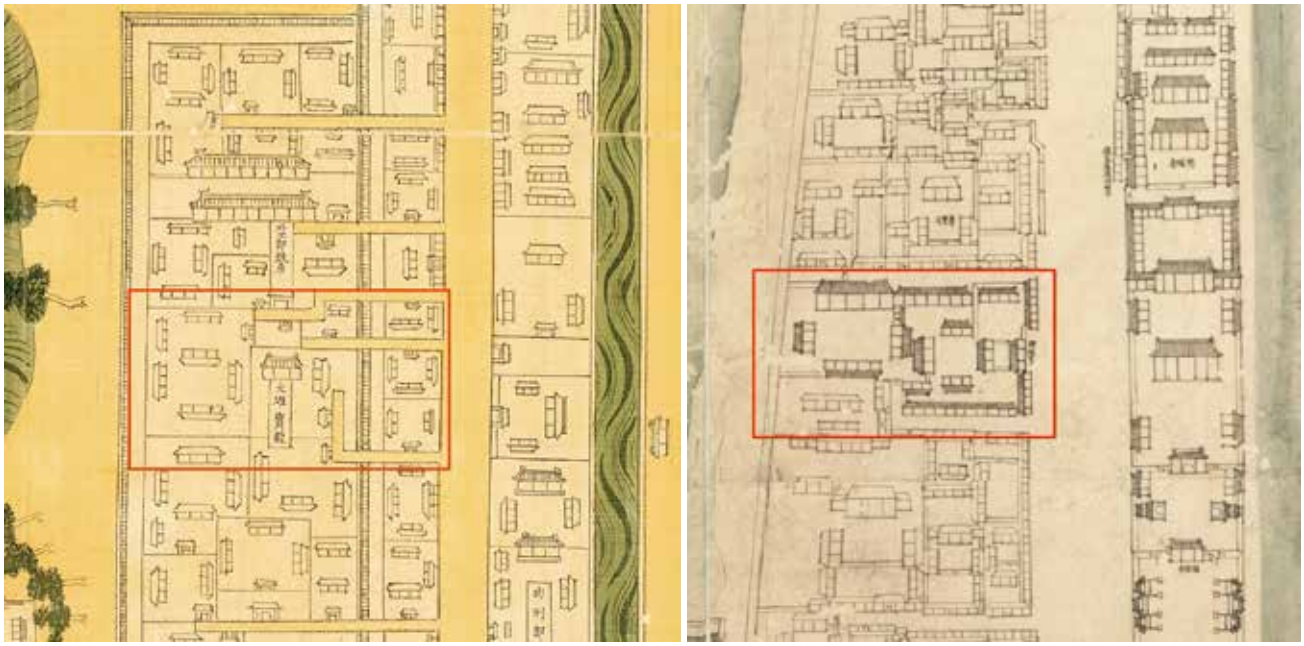


图 26　左:《皇城图》中的兴隆寺；右:《京城图》中的万寿兴隆寺

纯属无稽（图 26），略见前论。所谓《皇城图》“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也不符 1965 年已由“中图”移存台北故宫并珍藏至今的事实。

不过，作者提到而且发表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皇城图》黑白照片（图 27），犹属可贵。经追踪，蒙中国国家图书馆舆图组惠示这幅珍贵照片的目录信息，要点是：皇城宫殿衙署图舆图摄影本，未注比例尺，1933 年据清内阁大库旧藏绢绘本摄制，单色 27 厘米 ×21 厘米。绘画详细，精度较高，乾隆“京城全图”部分资料取材于此。

按此信息分析，这一《皇城图》的黑白照片，应是 1933 年 5 月平图为避祸战乱将该图装箱外运前，由舆图部主任王庸先生主持拍摄，平整清晰，远胜 1934 学社所摄（参见上篇图 1）。尤其可贵的是该目录申明《皇城图》未注比例尺，强调《京城图》部分资料取材于此，理应出自古代舆图研究大家手笔，或即王庸先生。以此对比孙果清所谓“精确地表示了当时北京皇城的规模和布局……是清《乾隆京城全图》之蓝本”[9]，显然扭曲了该照片目录信息中平实允当的本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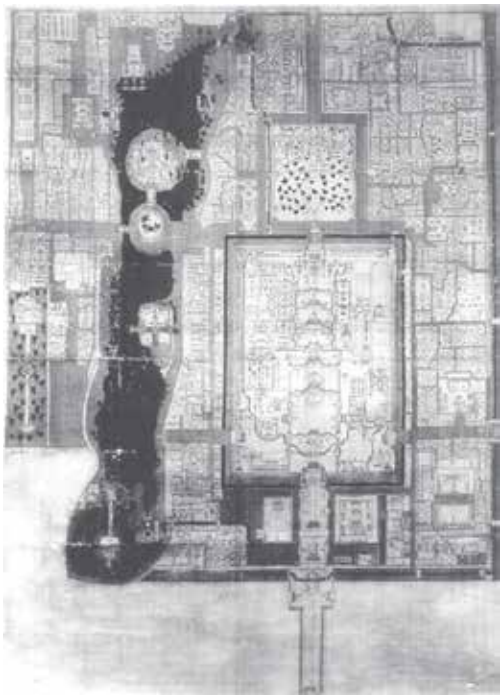


图 27　1933 年平图王庸主持拍摄《皇城图》照片

参考文献

[1] 刘敦桢．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 [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6，6（2）：106-113.
[2] 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 [M]．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民国二十二年）.
[3] 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南迁档案文物清册 [M]．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民国二十二年）.
[4] 张会超．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 [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5] 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民国三十六年）.
[6] 朱偰．北京宫阙图说 [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民国二十七年）.
[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8] 冯立升．中国古代测量学史 [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
[9] 孙果清．清康熙年间实测:《北京皇城地图》[J]．地图，2010（2）：132-133.
[10] 王庸．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 [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6（4）：46-73.